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弇山堂別集

〔明〕王世貞 撰



中華書局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弇山堂別集

一

種

校 撰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弇山堂別集/(明)王士貞撰;魏連科點校.一北京:
中華書局,1985(2006重印)

(中國歷史文集叢刊)

ISBN 7-101-05084-0

I . 矣… II . ①王… ②魏… III . 中國—古代史—
史料—明代 IV . K248.0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26197 號

弇山堂別集

(全四冊)

[明]王世貞 撰

魏連科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北京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1% 印張·8 插頁·1321 千字

198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4601—7100 冊 定價:132.00 元

ISBN 7-101-05084-0/K·2232

點校說明

《弇山堂別集》一百卷，明王世貞撰。此書名曰「別集」，但並不是一部詩文集，而是一部歷史著作。之所以名爲「別集」，是因爲「元美詩文有弇山堂正集，而此則國朝典故，比一代實錄云。」（陳文燭語，見本書序）。王世貞自己也作了解釋：「名之別集者何？內之無當於經術政體，卽雕蟲之技亦弗與焉，故曰別集也」（見本書作者小序）。清人周中孚譏諷王世貞「蓋不知詩文之當稱別集也」（見鄭堂讀書記卷十九），恐怕不是事實。以王世貞之博雅，不會這一點也不知道。

王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今江蘇屬縣）人。生於明嘉靖五年（一五二六），卒於萬曆十八年（一五九〇）。嘉靖二十六年成進士。王世貞是一個比較廉能的官員，爲人正直，不阿附權貴。在其官刑部主事時，有閻姓者犯法，躲藏在錦衣都督陸炳家，王世貞搜得此人。陸炳託權相嚴嵩說情，王世貞不許，終置此人於法。又，他的好友楊繼盛因劾奏嚴嵩罪惡，被嚴嵩陷害下獄，王世貞時進湯藥。楊繼盛被害，王世貞經營其喪事。這兩件事，使嚴嵩懷恨在心。王世貞之父王忬，曾官右都御史，因灤河失事，嚴嵩挾嫌構陷，將王忬下獄論死。這時王世貞正在青州兵備副使任上，得到消息，與其弟王世懋「棄官奔走，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奸詐的嚴嵩，口頭上「爲漫語以寬之」，而實則必置王忬於死地。王忬竟論死。隆慶八年，其父冤得白。後王世貞歷官大名副使、浙江右參政、山西按察

使、廣西右布政使等。張居正當國，王世貞又與張不相能，罷歸。後起爲應天府尹、南京刑部右侍郎，至南京刑部尚書。

一

王世貞是明代中後期的著名文學家。他與當時的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等，被稱爲明代文壇上的「後七子」。在李攀龍去世之後，王世貞獨主文壇二十年，對當時的文風士習有相當大的影響：「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王世貞本傳）。「後七子」的文學主張和以李夢陽、何景明爲代表的「前七子」基本一致，極力鼓吹復古，提倡無本傳）。「後七子」的文作漢以後，無一字不出漢以前」。王世貞更提出，「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明史王世貞本傳）。並說：「西京之文實，東京之文弱，猶未離實也；六朝之文游，離實矣。唐之文庸，猶未離浮也；宋之文陋，離浮矣，愈下矣。元無文」（藝苑卮言卷三）。認爲秦漢而下，一解不如一解，愈晚愈壞。他們的文學實踐是：文則刻意模仿秦漢以前的作品，講究無一字無來歷，結果是文字佶屈聱牙，令人難以卒讀；詩歌則模仿《詩經》、漢魏六朝樂府、唐人李杜，一步一趨，完全失去創新這一文學基本特徵。這種復古模擬之風，影響所及，「輕薄爲文者，無不以王李爲口實」（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王世貞又是明代著名的史學家。他和比他稍前的鄭曉，以及稍後的焦竑、何喬遠等，在史學方面都有自己的成就。由於王世貞的文名甚盛，他在史學上的成就往往被人所忽略，或沒有給予足够的重

視。他的歷史著作，除弇山堂別集之外，還有他門人董復表袁集的弇州史料一百卷、嘉靖以來首輔傳八卷。此外，他還編輯了明野史彙一百卷、皇明名臣琬琰錄等書。

王世貞在史學方面的主張，與他在文學上的主張相比，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王世貞所處的時代，封建社會正在走下坡路，明王朝的統治逐漸被削弱，社會矛盾空前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爲了爭權奪利，各個派別之間互相排斥、互相傾軋，使他發出「觚不觚」（王世貞有觚不觚錄一書）之嘆。同時王世貞本人及其家庭的遭遇等因素，也不能不對他的史學思想產生影響。

王世貞十分推崇漢以前的史書，尤其服膺司馬遷的史記。他認爲史記以後，一代不如一代，他慨嘆說：「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雅訓，不稱書，一也；其詔令、辭命、書奏、賦頌鮮古文，不稱矣，二也；其人有籍、信、荆、疇、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詞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蒼萃者乎？四也。嗚呼！豈非子長，卽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藝苑卮言卷三）。他認爲後世之所以不能復有史記這樣高水平的著作出現，是因爲後世的文物制度、人物典籍都不如秦漢以前好。這種說法顯然難以成立。不過，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思想中是古非今的根深蒂固。從這一認識出發，他對秦漢以下的史書都一筆抹煞，他說：「晉書、南北史、舊唐書，稗官小說也；新唐書，廣古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藝苑卮言卷三）。對於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從義例到文字他都深爲不滿：「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春秋之筆削，創立義例，而其文詞頗爲世所喜。楊士奇稱之，以爲與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而義例勝之。予亟考其所謂義例者，亦不甚當……至於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兩晉六朝，差有法耳……而何以歎史漢哉！」（弇山堂人讀書後卷三書五代史後）王世貞貶斥史漢以下諸史書，一則反映了他的是古非今思想，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王世貞對自己的史才很自負，他高自標識，隱然以當今的司馬子長而自命。平心而論，王世貞的史才以及他在史學上的貢獻，確有值得稱道的地方。不過，這種「筆挾青霜，舌掉電光」，「鞭撻千古，掊擊當代」（見國榷卷七十五引屠隆對王世貞的評論）的傲視一切的態度，是不足取的。所幸的是，王世貞到了晚年也認識到自己恃才使氣，是古非今的偏頗，他說：「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子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秘，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是的，王世貞確實對他的「是古非今」的思想作了認真的自省，並進而提出「博古通今」的主張。他說：「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罍，欵識粵奇，文畫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通古無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顯然，這種「博古通今」的主張是「是古非今」的一大進步，也是王世貞史學思想關鍵的轉折。

史貴實，史家貴直筆。這是王世貞史學思想最精采的部分。他在本書卷二十史乘考誤一曾說：「國史之失職，未有甚於我朝者也。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修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狃衰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

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即書，故無當也。史失求諸野乎？然而野史之弊有三：一曰挾鄙而多誣。其著人非能稱公平賢者，寄雌黃于睚眦，若雙溪雜記、瑣綴錄之類是也。二曰輕聽而多舛。其人生長閭閻間，不復知縣官事，謬聞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記、翦勝野聞之類是也。三曰好怪而多誕。或創爲幽奇可愕，以媚其人之好，不覈而遂書之，若客座新聞、庚巳編之類是也。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此訛枯骨謁金言耳。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敍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訛而善溢真，其讀宗闕、表官績，不可廢也。」應該說，王世貞對明代的「國史」（指實錄）、野史和家史的評論是切中時弊的。這裏貫穿了「實」和「真」的思想。「實錄」不實，不少史學家對此深致不滿。以太祖實錄而言，前後凡經「三修」，其真實程度，可想而知。沈德符曾說：「本朝無國史，以列帝實錄爲史，已屬紀漏。乃太祖實錄凡經三修，當時開國功臣壯猷偉略稍不爲靖難歸附諸公所喜者，俱被剗削。建文帝一朝四年，蕩滅無遺，後人搜括拾拾，百千之一二耳。景帝事雖附英宗錄中，其政令尚可考見，但曲筆爲多。至於興獻帝以藩邸追崇，亦修實錄，何爲者哉！」（萬曆野獲編卷二實錄難據條）。在官修、私修諸史書嚴重不實的情況下，王世貞主張史貴實、修史貴據事直書，是彌足珍貴的。同時，王世貞做爲封建官僚，敢於指摘「國史」，是需要一定的勇氣的。他說：「作史者一字之褒、片言之貶，不取一時，而取萬世。非作史者之權與勢能取萬世也，蓋是非之公在萬世。」（綱鑒會纂序）。這大概是他的勇氣之所自吧。

總的來看，王世貞的史學思想有其傾向復古的一面，這一點，他自己已經認識，並「隨事改正」。

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積極的史學主張。在明代諸史家中，他是較突出的一位。如果舒他的史學主張同其文學主張相比較的話，那麼，他的史學主張比文學主張積極意義更大。這樣說，大概是合乎實際的。

二

下面我想結合弇山堂別集一書，粗略地考察一下王世貞的史學實踐，以及本書的史料價值。
王世貞在修史方面抱負很大，他在本書序言中說：「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訪問朝家故典與閥閱琬琰之詳，蓋三十年一日矣。晚而從故相徐公所得盡窺金匱石室之藏，竊亦欲藉薜蘿之日，一從事於龍門、蘭臺遺響，庶幾昭代之盛，不至忘忘爾。」以司馬遷、班固自期，欲修一代之史。他的朋友陳文燭也說：「夫元美千秋軼才，而不得一登史館，目擊朝家掌故，犁然有概於心，不容不置一喙。」（本書弇山堂別集序中語）。王世貞爲了達到這一目標，首先致力於史料的搜集和考核。本書就是他爲修史所作的史料準備。雖然由於種種原因，王世貞未能如願以償，但他留下來的基本史料（本書和弇州史料一百卷），爲後來修明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清修明史，在不少地方吸收了王世貞的成果，有些地方連文句也未作大的改易。

從本書所收史料以及某些史論文字來看，王世貞基本上實踐了自己的史學主張。

王世貞爲了揭發「國史」的諱筆，在被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所誅殺的諸臣傳記中，大膽指出其中的隱

諱，以恢復事實真相。如本書卷二十史乘考誤中對傅友德、王弼、馮勝等人的「暴卒」，作了詳細的考證，所謂「暴卒」，即是「賜死」。修史者爲了掩飾朱元璋的暴行，對於傅友德等人，仍爲之立傳，且「備言其功」。又如，廖永忠以「僭用龍鳳章服」的罪名而「處以死刑」。這種欲加之罪的借口，實在可笑。而朱元璋對廖永忠之死，却「加贈葬，且使其子襲封」。這樣做，當然是爲了掩人耳目。與傅友德等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湯和，此人「雖號宿將，爲列侯首，而毘陵之欠忠，鑄之誥券，瞿塘之退縮，載在詔敕」。但對他却優禮有加，生前「恩禮優崇，有羣公所不敢望者」，死後又「封王謚葬，備極恩禮」。這究竟是爲什麼呢？王世貞一語道破了天機，因爲湯和「首倡解兵退休之請，深中上心；而晚年風疾不能言動，又有以安上心耳」。這就活脫脫地畫出朱元璋的「金杯對君飲，白刃不相饒」的封建帝王的殘忍面目。

對於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和封建禮教的虛偽，王世貞力加指斥，揭露其丑惡面目。如卷十八衍聖真人同坐事條，揭露「衍聖公孔弘緒坐姦淫樂婦四十餘人，勒殺無辜四人，法當斬，詔以宣聖故，削爵爲民，以弟弘泰代，沒後，弘緒子聞韶襲爵」。作爲統治者維護綱常名教旗幟的衍聖公，竟是這些淫暴，而統治階級出於本身的利益，僅僅處他「削爵爲民」，而且還要他的兒子襲封。統治階級所倡導的綱常名教的虛偽性，直落紙上。又如本卷烈婦俱妾媵條，揭露得更爲痛快淋漓。「國家令典，於婦人女子能殉夫死者，俱有旌異」。接着王世貞列舉了李思齊、吳復、郭亮、鄭亨等十三人死後，他們的「妾」都殉夫而死，朝廷照例給予旌典，俱贈「淑人」若「德人」等。就此，王世貞發出這樣的疑問，何則「勛戚大臣之妻殉死者無一二也？豈妾獨厚而妻獨薄耶？」意者有呂后、袁紹夫人之妬，而出於不得已。

也」。原來統治階級所極力褒揚的烈婦節行，是出於不得已！所謂烈婦，完全是統治階級用來欺騙人的犧牲品！當然，王世貞揭露統治階級的荒淫殘暴，仍是從維護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立場出發的。

本書作為一部史料集，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其中有許多不見於實錄、會典諸書，顯得彌足珍貴。

卷一至卷十九，包括皇明盛事五卷、皇明異典十卷、皇明奇事四卷。這十九卷書是筆記體史料，內容比較雜，舉凡朝章典故、君臣事迹、社會經濟、人物軼事、民族關係、中外關係等都有所記述。如卷十八戶口登耗之異條，指出從洪武初年至正德期間國家統計的戶數和人口的增減「有絕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的統計數字爲：戶一千六十五萬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三千三百五。經過二十餘年的休養生息，至洪武三十一年，戶口數反而下降爲戶一千六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九，口數爲五千六百三十萬一千二十六。計戶減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口減三百五十七萬二千二百七十九。這個數字顯然是荒謬的。所以王世貞指出：「有司之造冊與戶科、戶部之稽查，皆僅兒戲耳。」其他如卷十八的中國夷官互居、外國人進士、夷女得尚帝王等條是研究中外關係的重要史料，卷十二的建文官制後革、永樂官制等以及卷七的一部二尚書等條，記載了明代官制的變化情況。

卷二十至卷三十爲史乘考誤十一卷，前八卷考國史、野史之誤，後二卷考家乘之誤。這一部分，對史料考辨相當精僻，是王世貞的史學力作。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是關於明代帝系及宗藩的記述。

卷三十七至卷六十四爲史表，上而功臣公侯伯，下而督撫守備，共分七十二目。雖然四庫提要批評它「多不依旁行斜上之體」，所列各官的任罷時間也間有失實。但它畢竟把明代的中央職官表列出來，爲後來作史表，提供了方便。如果把它和清修明史相比，那麼明史的史表遠不如它完備。

卷六十五至卷六十九爲親征、巡幸諸考，這部分史料價值較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保存了不見於它書記載的史實。如親征考所載永樂八年北征時的軍令，即是軍事史上一篇寶貴史料。其中對於指揮、行軍、作戰、下營、偵察、後勤、運輸、賞功、罰罪等，都作了具體而詳細的規定，共有五十餘款之多。從這篇軍令中也可以窺見十五世紀初中國軍事指揮藝術發展的水平。對這篇史料，王世貞也很重視，他特別說明：「實錄不具載，故記之。」

卷六十八至卷六十九爲命將考，備述自洪武至萬曆時的重大軍事活動。

卷七十至卷七十五爲謚法考。今天看來，這部分基本上沒有什麼價值。

卷七十六至卷八十爲賞賚、賞功考。對皇帝的各種賞賜，必詳記其數量和等級，以及被賞人的功績。對於研究明代的政治、經濟和對外關係，都有參考價值。

卷八十五至卷八十八爲詔令雜考。這部分記錄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的大量書檄，其內容主要是有關軍事行動的指令和檄文。如朱元璋與張士誠作戰時發佈的平偽周榜，北伐時的諭中原檄以及和西南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的書信往還等。這些文件，對於研究明代的軍事史以及民族關係，很

有參考價值。大概由於其中有些書檄措詞鄙俚，文不雅訓，而「不登詔令」，這裏却全文錄出。最近筆者曾看到吳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朱元璋親筆給徐達的詔書原件，與本書卷八十六所收人的錄文完全一致，可見王世貞所收錄的書檄是可靠的。

卷八十九爲兵制考、市馬考。兵制考詳述自永樂八年北征以後的兵制變化及全國的軍士數目、馬駝驢騾數目等。市馬考則詳記洪武七年至隆慶五年明王朝與國內邊地民族及鄰國的馬匹交易情況。其中既有軍事史料，又有社會經濟及民族關係史料。

卷九十至卷一百爲中官考。這十一卷書，是王世貞寫宦官傳所搜集的史料，「傳未成，而今所存者，皆從聖政記錄出之，不爲一字增損，以備異日史氏去取耳」。王世貞在中官考之前有一篇小序，歷述古今宦官之禍，尤其對於明代宦官干政專權爲禍之烈，更爲切齒，也更爲以後擔憂。雖然「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卽狼戾如振、瑾者，一嘵而憂，再嘵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莫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但是，「瑾死，百瑾生」，沒有多久，一個魏忠賢便把明王朝攬得氣息奄奄了。王世貞的擔憂，不幸而成爲悲殘的現實。中官考記事自吳元年至萬曆初年，凡有關中官的事，都按時間順序有條不紊地敘述。爲了追尋明代宦官干政的踪跡，王世貞在有關條目下加了按語，如：「此內臣奉使行事之始也」、「此內臣奉使外夷之始也」、「此內臣將兵之始也」、「此內臣監軍之始也」、「此內臣出鎮之始也」等等。從中可以看出宦官干政專權之漸，有助於人們總結宦官之禍的經驗教訓。另外，王世貞還撰有宦寺小紀一書，可與中官考相表裏。

總得來看，弇山堂別集一書，是能够體現王世貞史學思想的一部有價值的史料書。四庫提要評論此書說：「世貞承世家文獻，熟悉朝章，復能博覽羣書，多識於前言往行，故其所述，頗為詳洽。雖徵事既多不無小誤，又所為各表不依旁行斜上之體，所失正與雷禮同；其盛事、奇事諸述，頗涉談諧，亦非史體。然大端可信，此固不足以為病矣。」這一評論，基本上是合乎實際的。由於此書是王世貞修史的素材，還未來得及進一步整理，所以顯得比較凌亂，同時也收進了一些無謂的東西。比之他的門人為他編輯的弇州史料一書，似乎稍遜一籌。

三

本書初刻於萬曆十八年（南京翁良瑜雨金堂刊本），王世貞也於這一年去世。清乾隆修四庫全書，將本書收入史部雜史類。光緒年間又有廣雅書局刊本。萬曆初刊本校刻不精，誤字較多。這次整理即以廣雅本為底本，通校了萬曆初刊本。另外，本書有一部分後來又收入弇州史料一書，這一部分即用弇州史料來校勘。此外，還參校了明實錄、明史、明史稿、國榷、明書、國朝獻徵錄、明經世文編、明通鑑、明會典、讀史方輿紀要等書。為便於讀者檢索，重編了書前的目錄。限於水平，點校中的錯誤，尚祈讀者指正。

魏連科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弇山堂別集序

弇山堂別集者，大司寇王元美先生著也。其稱別集者，蓋元美詩文有弇山堂正集，而此則國朝典故，比一代實錄云。梓生叔佩者，剖劂精良，傳布廣遠，幾於紙貴。謂不佞與元美莫逆交，請序其首。余讀而嘆曰：天地剖判以來，有興衰則有理亂，有理亂則有勸戒，必得其所託而後傳信，此史之所以作也。苟非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懋德非常之迹，將闔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故唐虞三代，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而執簡操筆相隨一堂之上者，皆聖人之徒也，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二典三謨。璿璣玉衡以察天，封山濬川以理地，同律量衡以齊民，而君臣都俞吁咷之氣，千載藹然。至周禮一書，周公定太平者，燦如星列；而周官建官之治，森然可考。辭微指博，論崇議闊，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孔子周人也，願學周禮，嘆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又假魯史以作春秋，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昔人言：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而春秋竝之矣。嗣後秦人焚棄詩書，百家競列，事跡錯糅，前後乖舛。司馬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以作史記。自謂世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絏，自比於羑里之拘，陳蔡之厄，庶幾哉有春秋之遺。祕書監荀悅作前漢紀，東

陽守袁宏作後漢紀，大都以太史爲宗。而班固漢書繼司馬而作，託於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以班氏言之，龍門嫡子，不愧其家聲者也。范蔚宗以下，一解不如一解，宋、遼、金、元卑哉，樂郊之後降爲阜隸矣。元美起而更張之，其義隱而直，其文諧而莊，其志似推而實任。夫元美千秋軼才，而不得一登史館，目擊朝家掌故，犁然有概於心，不容不置一喙。乃又以流禍隱憂，故自斧戾以至貂璫，媿醜悉陳，無所袞鉞，以俟夫後世君子。同心者易尋，吹毛者難見，顧其中藏三尺之嚴，毫不可奪，不亦隱而直乎？一典之異，令人色飛，一事之奇，令人頤解，幕中嘵笑，輦下滑稽，間一有之，而殿閣巖廊公卿將相之事，則居多焉。含法旨於恢詞，寓正言於謔語，莞爾塵談，毅然孤史，斯不亦諧而莊乎？元美之言曰：「子長不絕也，史記絕矣，卽後世而有子長，亦不能成史記。」近代官師郡邑，其名不雅馴，章奏竿牘賦頌之類，鮮足袁者。「元美推而不居，以爲自有主者。」我以其才爲所欲爲，縱橫自放，於史例之外，別立一體，其於子長，以意師之，不可稱龍門之大宗乎？乃曰「才力綿淺」，所謂「赤也爲之小」矣，誰則信之？是元美之志，似推而實任也。余反其言曰：「異日有裨於國史者最其大也，著儒考證其次也，賓筵以資談諧特其餘耳。」余習元美，嘗竊窺其青箱，則尚有弇園識小錄、三朝首輔錄、觚不觚錄、權幸錄、朝野異聞，此枕中之祕，尚不以示人也。夫孔子學周禮而作春秋，司馬遷敍高帝本紀，謂得天統而承三代，皆重昭代也。元美之才之學，駕陵千古，以國朝而有元美，在元美何可無茲集哉。昔王大司馬公謂元美與汪伯玉皆良史才，當修國朝史書，不佞可從兩公之後。元美聞而言曰：「此指闕疏不敢望萬一。有之，其爲希世之大業無疑也哉！」今元美業爲之矣。異日盡出其祕，發醯雞之覆，而覩天地之全，則我明有良史矣，奚必

待詔金馬門，紬天祿、石渠之書而後成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此不刊之書也。不佞樂爲之序，兼請質於元美云。

萬曆庚寅冬日五嶽山人河陽陳文燭撰。